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149 期

2013 年 12 月 15 日

【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之十】

目 录

【论 文】

俄罗斯：公民民族与多元统一

——普京的《俄罗斯：民族问题》及民族学家季什科夫的回应 丁宏 臧颖

B. A. 季什科夫对学术与权力关系的看法

B. A. 季什科夫谈俄罗斯公民民族及其认同

B. A. 季什科夫关于族性 (ethnicity) 问题的阐释

B. A. 季什科夫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政策的评价及看法

民族视野下的历史：从俄罗斯帝国到苏维埃国家 励 轩

普京的族裔难题 方 亮

中亚之外苏维埃穆斯林的历史编撰学 励 轩

【时事评论】

战略失策与巴沙尔的命运 于海洋

伊朗人的棋局 于海洋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俄罗斯：公民民族与多元统一

——普京的《俄罗斯：民族问题》及民族学家季什科夫的回应¹

丁宏 臧颖²

2012年1月23日，俄罗斯《独立报》全文发表了普京的文章《俄罗斯：民族问题》，阐述了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内涵、解决俄罗斯民族及移民问题的对策。当时正值俄总统大选期间，时任总理的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其言论自然颇受关注。所以文章发表后，即产生了广泛反响。“各界观点不一，甚至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有人注意到普京的某些观点源自《俄罗斯公民的精神道德发展与个性培养构想》一文，而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院士瓦列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季什科夫正是该文的撰稿人之一。为此，《莫斯科共青团报》采访了季什科夫，但季什科夫却否认参与了普京文章的撰写，并针对普京的一些观点做出回应。

季什科夫首先对普京“民族问题”的提法提出质疑，即“民族问题”到底是针对谁的问题？按照季什科夫的解释，国家可以称为“民族”，族类共同体也可以称为“民族”。“民族问题”可以理解为国家居民复杂的民族及宗教构成，不同民族属性的公民间的关系（包括移民问题），以及在保障和平、统一与发展的前提下对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国家政策。在俄罗斯，“民族政策”通常指民族属性之“民族”，而实际上，“民族政策”就是保障一个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内外利益的国家政策。对现代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承认多民族的历史现实，保障“多元统一”的模式。单一的民族国家并不存在。民族国家的构成形式是多样的，最为成功和有效的方案是构建由主权国家统一起来的、多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即“各民族之民族”。对俄罗斯而言，这是最为适合的、唯一的形式。

季什科夫是俄罗斯当代最为著名的民族学家之一。苏联解体后，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虽然他只干了7个月就辞职了，但他的学术观点在当代俄罗斯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统一的俄罗斯公民民族认同观”，得到许多人特别是国家上层人士的支持。1994年叶利钦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使用了“公民民族”这一概念，普京、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各自执政期间的讲话中，也多次使用并强调了“公民民族”的概念。该观点与苏联时期所谓“苏联民族这个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的提法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正如季什科夫所言：“（苏联时期）苏联爱国主义思想和统一苏联人民的理论取代了公民国家的理论。各民族统一体被称做国家，而事实上，存在的公民国家被称做苏联人民。这种理论遗产和政治实践一直保留到现在”。但是，季什科夫的“公民民族”与“苏联民族”观点的最大差别，就是后者抹杀各民族事实上存在的差别而片面强调民族间的相互接近、融合，而前者强调“俄罗斯人”的“统一性”，即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民族国家，但“俄罗斯人”是由各具特色的民族组成的，既包括俄罗斯族，也包括乌克兰、图瓦、巴什基尔、鞑靼等“族性”民族。只要生活在俄罗斯领土上并拥有该国国籍，就是俄罗斯公民。即统一的俄罗斯公民民族认同观建立在多元的基础上。季什科夫认为这种“多元统一”的范式符合俄罗斯社会的实际，能够最大限度消除民族冲突，使得民族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利益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13日第8版。

² 作者：丁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臧颖，哈尔滨市研究院研究人员。

在普京的文章中，仍然使用了“公民民族”的概念，并一再强调“多元统一”对于俄罗斯社会的意义。他在文中首先指出，俄罗斯是一个多语言、传统、民族与文化的社会，民族间的和谐是国家存在的根本。他分析了世界上民族问题的危机，解释了一些国家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但他强调，尽管外在现象类似，但俄罗斯的情况是独特的。俄罗斯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互相合作，共同开发了辽阔的地域。贯穿独特俄罗斯文明的主轴线是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所谓建立俄罗斯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论调是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相背离的，这将导致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快速瓦解。在谈到民族自决问题时，普京表示，俄罗斯人民很早之前就已经自己决定了。

普京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经验是独特的，多民族的社会造成了国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但也带来了全面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如果对其破坏，则会失去发展的力量和强度。所以要加强民族和睦、宗教对话，不能放任对异文化及其他信仰的仇恨情绪。普京认为，首先应该在教育中增加对俄语、俄罗斯文学、本国历史以及一切民族传统和文化财富的学习，巩固俄罗斯国家在人民观念中的地位。俄罗斯人拥有共同的历史命运，有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的民族政治战略必须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仰和民族属性，但他首先是俄罗斯公民，并以此为荣，不能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置于国家法律之上。同时国家的法律也要考虑民族、宗教的特殊性。**所以普京建议应该在联邦机构中设置负责民族发展、民族和谐及民族间相互协作问题的专门机构。民族政策不能在官员的办公室里制定并实施，其形成应该有民族的、社会的直接参与。普京在文章中强调，绝不允许在俄罗斯建立地区或民族政党，也绝不允许政治人士依靠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参加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他指出，建立地区和民族政党或者是变相的民族政党，尤其是在民族共和国，这是通往分离主义的直接途径。

对于以上普京的观点，季什科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最近 20 年，铁的事实和一些相关学术研究证明，公民对“俄罗斯人”的认知是集体认同最重要的形式（集体认同的同时还包含着对民族归属、地域归属和宗教归属的认同）。而普京当政以来对俄罗斯历史和国家现代生活的理解是完全充分的，所以不止一次地提过，俄罗斯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统一体，其保留了民族多样性，甚至不排除民族间的冲突与矛盾。但季什科夫同时强调，**俄罗斯公民观念的反对者们也是非常顽固的，而民族主义分子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掌控的“民族”和“民族的”这些意涵转而倾向于全俄罗斯的民族概念。**他们宣称俄罗斯是俄罗斯（族）人的国家，鞑靼斯坦是鞑靼（族）人的国家。很遗憾，普京过分纵容这一社会现象，从而背离了宪法第一章的原则。

季什科夫对于普京对俄罗斯族“核心”地位的强调做了这样的解释，认为普京的态度作为大选前的灵活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其他候选人也公开宣称，修改宪法是第一要务，以及强调一个民族在国家构建中的特殊地位。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争取 80% 的俄罗斯族选民，这个问题在选举斗争中是很严肃的，但选举结束后竞选方案并不会得到具体实施。

2012 年 3 月，普京当选为总统。至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关于俄罗斯民族政策新举措的资料。但季什科夫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博客中发表文章，梳理一年工作时写道：“第二件事在过去的一年中最为重要（第一件事是关于“俄罗斯历史年”的），就是我加入了族际关系问题总统委员会并直接参与《2025 年俄罗斯民族政策》方案的筹备工作。总统已经签署了法令，这部文件中包含许多新的和令人充满希望的内容。至少，那些‘破坏公民民族方案’的人士会稍稍安静下来，而从事‘俄罗斯认同’及‘公民民族’问题的学者们则可以振奋起精神来了”。

在俄罗斯，围绕普京文章所引发的讨论并未停止。事实上，普京在文章中对于俄罗斯国内民族方面的一些尖锐问题，如民族共和国的本民族语言问题，以及“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议题等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无论如何，作为俄罗斯总统，民族问题是普京执政中不能忽略的内容。今年 7 月，俄罗斯举办了全俄第十届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代表大会，普京亲自发了贺电，强调多民族团结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重要战略，要凝结各方面力量实现这个目标。

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前景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选编】

B. A. 季什科夫对学术与权力关系的看法¹

译者注：1992年B. A. 季什科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民族事务部部长，1992年10月他辞去该职务。2011年在接受《政治科学》杂志记者O. Ю. 玛丽诺娃采访时，他就学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论述。

学者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看法，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想法太浪漫，太天真了。可以说，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人文科学从最初产生开始就是处在政权管理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权力服务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科学知识不受外界任何干扰便能在办公室的宁静氛围中产生，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比如说美国的 political science 这门学科，也是国际上实力强大的学科，毫无疑问，它也是通过各种基金和国家各个部门指定项目的形式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无菌”科学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远离了苏联时期严格的监督体制，而这一体制对我们社会科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阻碍作用。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于如何研究权力和理解权力。我们的问题还在于，要清楚地知道，与权力机构的对话是必须的，也要努力争取对权力部门产生影响，也包括促进社会变革。如果我们不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就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达到社会变革。1992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短暂的从政生涯，在政府做民族事务部部长。我并没有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因为我一直把这段从政经历视为国家发展的复杂时期带给我个人的一段人生插曲。

我曾对叶利钦说过，依靠研究所科研集体的力量，我可以胜任民族事务部部长工作，并且可以为国家民族方针、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思路和想法。这并不是说，我想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赚取资本，过了七个月我就辞去了这一职务。**我离开这个岗位并非因为我已经出色完成这个工作赋予的使命，而是因为我和一些政客发生了冲突**，其中有叶利钦的副手卡丽娜·斯塔拉沃伊托娃和时任民族局委员会主席的拉马扎·阿布杜拉基波夫。**他们推行民族自决的方针并固执地认为，既然有80个民族，就应该有80个民族领土建制。这种简单幼稚的民族学论断会葬送新生的俄罗斯。正因为我与他们之间在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迫使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岗位。**1994年—1996年期间，我的很多思想和观念已经在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体现出来，而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政府部门。并非只有我一人经历过从政生涯，当时有许多学术界人士都参与了政治。现在，政治领域越来越专业化，政治要求一个人要具备特殊的品质。当我任民族事务部部长兼任民研所所长时，在民研所的办公室里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在部长办公室里只能听到部长一个人的声音。

权力与学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工作类型。权力和政治需要毅力坚强的人物，时刻准备着进行严酷的竞争，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可以是腼腆的，羞怯的。性格的柔弱并不能阻碍他们的学术创造，也不会妨碍他们达到科学的顶峰，成为令人尊敬的人物。学者探索新的知识，这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劳动。这种工作需要训练，需要聪慧的头脑及其它一些东西。权力和政治要求人针对一个具体事件必须在当下做出决定，不容犹豫不决，而学者可以把工作拖延至明日，可以反复

¹ 这四篇短文摘自B.A.季什科夫著《学术与人生：俄罗斯民族学家访谈录》（臧颖译、丁宏校译，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附录二、附录六、附录八和附录九。在本《通讯》中把这几篇“附录”介绍给读者，得到了校译者丁宏教授的同意。本文中的黑体字均为本《通讯》编者所加。我们认为本文原译文中的“权利”或许被译为“权力”更符合作者原意，故改为“权力”。

思考揣摩。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

我认为，权力是一种秩序。针对于秩序得以实现的形式而言，秩序是第一位。第一批踏入美洲大陆的人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社会，随后，这些人制定了一些规则，比如相互协助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谁拥有审判权等。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制定这些规则，人们就会互相残杀。首先应该制定规则，我们才知道怎样穿过马路，驾驶员知道何时停车等。只有第一位的秩序得到保障，接下来我们才能讨论民主与独裁的优劣。如果秩序被撤销，我们都不能正常过马路，又何谈其他事情呢。人类选择了一个最为理性的集体组织形式，就是国家。人与人之间的规则和秩序在国家保护之下得以建立和完善。当然，人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心理，认为政治和权力总是充满着谎言，令人厌恶。但是，政治和权力从人类社会产生的那天起就存在，也是支撑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仍然认为，秩序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像斯大林和希特勒那样的人物来维持这种秩序。无论苏联还是德国的社会，没有权力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所理解的权力是一种能够决定他人社会空间的可能性。

B. A. 季什科夫谈俄罗斯公民民族及其认同

译者注：俄罗斯公民民族观是 B. A. 季什科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也是他个人的主要学术思想之一。2010 年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人民》一书，在该书中他系统地阐释了这一观点的理论根源及社会实践等问题。2011 年初季什科夫首次到中国访学，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师生做了一场主题为“俄罗斯人民及其认同”的报告。本文结合他的报告、文章及专著中关于俄罗斯公民民族观的阐释整理而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恢复了过去的许多传统和事物。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人民”（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替代了“苏联人民”（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1993 年宪法规定“俄罗斯人民”为“多民族”的人民，这是苏联传统的遗存，因为苏联时期所有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均称自己为“社会主义民族（наци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沿袭了这一传统。俄罗斯社会科学沿袭的传统与国际科学传统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仍然按照过去的习惯把“民族”理解为“族裔民族”¹，而在国际话语里，“民族”（нация）经常用于指称公民国家。

我从 1989 年至今一直担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同时还参与一些社会组织工作，因此，我肩负着政治和学术双重使命。苏联时期人们建立起来的认同观已经彻底摧毁，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构建全体俄罗斯人的共同认同就成为我思考和致力于研究的工作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让俄罗斯公民建立起对“统一人民”，即“我们是俄罗斯人”的认同感及对俄罗斯国家的归属感，这个问题尤为重要。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俄罗斯人民也可以称为“政治民族”或“公民民族”，尽管俄罗斯是由众多（族裔）民族所组成的。俄罗斯各个民族的人们习惯称自己为“××民族”，把国家的全体人民称为“民族”还不习惯。持有族裔民族主义（этниче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观点的人担心，俄罗斯“公民民族”会取代所有“族裔民族”，进而削弱他们的利益。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俄罗斯是“各民族的民族”（нация наций），在政治民族或公民民族这个范畴内包括所有的族裔民族，当然也包括最大的民族——俄罗斯族。这种观点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感到不公平，也不会对任何人的利益造成威胁，但是这一观点可以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减

¹ 我们认为文中的“族性民族”或许被译为“族裔民族”更容易理解，故改为“族裔民族”，

少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带来的危险。

1992年我做民族事务部部长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及由我起草的民族构想草案中就将俄罗斯民族作为公民民族的观点提出来了。1994年叶利钦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也引用了我的提议。公民民族的观点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强烈的批评和反应，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极力反驳我的观点，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和政治家。P. A. 阿布杜拉基波夫等人撰文批评我是“无民族主义学者”，**向民众灌输西方的民族观等**。还有一些人认为，**国内只有俄罗斯（族）人、鞑靼（族）人、楚瓦什（族）人等，没有指代全体俄罗斯公民的“俄罗斯人”**。他们认为，“俄罗斯人”是一个社会，其成员拥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传统与生活方式。还有人认为，在俄罗斯不存在公民社会，因为俄罗斯社会缺乏民主，没有自由的公民，也就没有公民民族。甚至有人提出，不能把“俄罗斯人”称作“民族”，而应称作“俄罗斯文明”。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民族”（нация）这个词汇。

民族与民主、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必然关联，如果我们一定坚持这个论调，那么“民族”根本就不存在。我并不将“民族”这个概念与文化上的同质性联系起来，也不会将其与公民的成熟度联系起来，而是将其与社会大众对民族概念理解的程度联系起来。比如，**印度较之俄罗斯，在宗教、民族及语言关系上更为复杂，但是“印度民族”这个观念是存在的**，其执政党为“印度民族大会”（Инд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нгресс）。从甘地时代，也许从尼赫鲁时代起，“印度民族”这个观念至少在社会精英层就已建立起来了。

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极端主义和巴斯克恐怖主义思潮，但是西班牙也有“西班牙民族”观念。由此，我们来分析一下俄罗斯，如果我们把158个“一小簇人”融合为“一大簇人”，那么这“一大簇人”就是“民族”（нация）。所有的现代民族国家都具有公民政治性，并且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单一的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

普京总统任职后，他的许多言论中都渗透着视全体“俄罗斯人”为“公民民族”的思想。现在，这一思想观念逐渐被大众接受，甚至成为国家政策的基础理念。我本人撰写了《俄罗斯人民》一书（2010年，莫斯科），系统阐释了自己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现在，一些教材和词典已经突破了“族性”范畴，在更广的意义上对“民族”一词加以解释，取得很大的进步。

B. A. 季什科夫关于族性（ethnicity）问题的阐释

译者注：本段文字根据《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杂志2001年第4期刊载的B. B. 卡兹洛夫斯基对B. A. 季什科夫先生的访谈内容，以及《民族学评论》杂志1997年第3期刊载的B. A. 季什科夫“族性观”这篇文章整理而成。

“族性”（ethnicity）这一概念的历史并不久。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个术语很少运用于社会（文化）人类学论著中，教科书及其它出版物中对其也没有明确的定义。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概念在人类学理论中逐渐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运用这个概念来对后殖民时代日益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工业发达国家少数民族政治上的觉醒等现象进行解释，随之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族性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为了揭示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变化的复杂内涵、群体联盟的形成与作用、社会冲突、种族与文化的相互影响，以及民族建设过程等问题。

由于学术传统的不同，学者们对“族性”的解释也不同。如果我们看俄罗斯学者关于族性论题方面的论著，他们所论及的基本范畴是“этнос”（民族）。国外文献中没有“этнос”这个概念，当然，东欧和德国的同行，以及前苏联各国学者们除外，因为他们的学术根基都是在“统一科学”

的基础上，在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族性”逐渐在外国民族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成为主流研究范畴之一，因为在这一时期整体学科的兴趣发生了转变，从种族到文化，再到族性问题，而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单位也不再是“部落”，而是“族群”。

那么，对“族性”如何定义呢？在学术中广泛运用的族性概念表示存在着文化上特殊的群体及其认同。在我们国内知识界，当论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或民族（народ）的时候，学者们经常运用的术语是“этнос”。“этнос”这个概念表示同质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且呈现静止状态的特征，这些特征将一个族群与另一些族群区分开来。现代的族性概念对文化特殊性观点提出质疑，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对族性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和现代社会动态的、多文化特性的分析上来。

就如何界定族性的问题，学者们中间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是，事实上存在着一些符合共同体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将共同体视作民族共同体或是具有族性的某一共同体，这些特征包括：

（1）具有群体成员共同分享的关于共同的地域与历史起源的想象，具有统一的语言，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上具有共同的特征；（2）政治上形成的关于“故乡”（родина）的想象，以及对于诸如国家之类特殊构成的想象，而这些均可视为民族想象的组成部分；（3）该群体成员对自身归属感的觉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的形式和他们共同实施的行为。

对社会边界与文化边界进行比较，对内在于想象与外在的想象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理解族性的实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共同体首先要依据该群体全体成员认可的重要特征来界定，并且这些特征成为自觉意识的基础，因此，族性是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形式。

由此，民族共同体所指的民族（народ）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组成的群体，**该群体成员具有一个或几个共同的称谓，具有共同的文化元素，同时具有共同起源的神话，甚至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该群体成员能够将自己与某一特殊的地理领土联系起来，并且表现出群体成员所具有的团结性。认为族性及民族共同体是在“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基础上形成和建立起来的，这个观点自身存在很多不足。**族性作为个人自觉的组成部分和集体共同分享的一种信念，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甚至国家的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而对自己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也就意味着，民族自觉意识并不一定建立在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对立的立场上。更进一步来说，民族共同体就是针对与其具有广泛联系的其他共同体，而以文化自我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

族性作为区分群体的辨识手段具有“社会标签”的作用。这些内容各异的“标签”包括体质特征、地理起源、经济方式、宗教、语言，甚至饮食、居所等外部特点。

有三种理解族性的方法：主观主义方法、工具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主观主义方法的根据在于，民族认同建立在与特定群体或文化的深度联系基础上，也是建立在这一认同的现实基础真实存在的前提下，这些现实基础可以是生物因素，也可以是历史文化因素。进化论对这一方法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群体归属感的觉知渗透在基因代码里，是早期人类进化的产物。这一方法将族性视为亲缘选择的一种扩展形式，是最原初的本能和天性，属于社会生物范畴。

在俄罗斯，类似的理论就是民族理论（теория этноса）。社会生物主义与地理决定论成为“民族生与死”、民族“激情”、“心理精神综合体”等等一些根基浅薄理论的基础。**民族分类这一颇具主观主义色彩的方法在俄罗斯社会科学体系中成为主流，关于异族通婚是民族存在的标志和条件，以及民族“成分”理论等论题充斥在教学用书之中。**主观主义的文化方式将族性首先视为群体成员共同分享以下客观特征的群体，即地域、语言、经济、种族类型、宗教、世界观，甚至心理总和。而文化及文化的传承可以使一个人了解其存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并就个体为何遵循特定的传统习惯为人行事这个问题提供答案。

主观主义用文化语言方法或心理文化方法对族性进行解释，将民族认同视为心理必不可少的

“我”的部分，而将认同的变化视为非自然的，强加于人的现象。这类族性观在社会上层颇为流行，并且民族文化差异被赋予重要的意义，族性得到官方的认可和登记，甚至出现了在民族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官方行为。

工具主义方法视族性为文化精英为追求财富与权利所创造并操纵的政治神话的结果。在政治与经济现实设定的边界内，精英们的竞争便催生了族性，而有时，当功能主义获取某种心理色彩后，那么族性就被解释为，为了集体所丧失的荣誉而采取的复建方法或是医治集体创伤的疗法。

理解族性的诸多方法并非相互排斥。我个人认为，跳出“传统文化类型”的窠臼，将族性视为文化混合体和多重忠诚性，或是动态的民族流，在此之上对族性进行研究则更富有成效。这一方法不是将“族性中的人”视为客体，而是将“人中的族性”视为客体，这样，从社会控制意义上讲，对族性就会产生结构上的影响和作用。

B. A. 季什科夫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政策的评价及看法

译者注：2011年夏季，译者到莫斯科大学研修，在此期间得到季什科夫先生多方面的帮助，相互间也有了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译者对他提出“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关系及中国的民族政策？”这个问题时，他对此做出如下回答。

我知道，中国与俄罗斯的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俄罗斯占居民人口81%以上的是俄罗斯（族）人，在中国，占居民总数90%以上的是汉族人。与俄罗斯针对非俄罗斯族人的政策一样，中国针对非汉族人的政策采取的是内部自决的区域自治形式。中国的5个民族自治区在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俄罗斯还有一点相似之处，中国也实行非领土化的民族文化自治，也就是说，国家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保护国家领土之上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我知道，在中国首都北京，也就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所在地有民族院校，如中央民族大学，面向全国各族学生招生，使少数民族的学生也能获得高等教育。民族博物馆、学术杂志、电视及广播都进行民族知识和民族政策方面的宣传教育。

为维护国家的完整，使国家民众形成共同的认同，中国存在公民民族——“中华民族”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中华”这个“民族”是指国家内全体公民，这是“公民民族”，而不是“族裔民族”，这个概念与我提出的俄罗斯公民民族的观点十分相似。当我在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我运用了许多民族政治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西班牙，印度、加拿大和中国。

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现实状况，需要制定符合国情的管理方法，但是，总是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国际上也有很多有益的经验，我想，这些经验对中国而言也是值得借鉴的。

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自我感受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因素一定要引起重视和研究，原因在于，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尽管不排除这些变化是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都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慌，引起人们内心对政府和国家不信任感的增强，这样，便有可能导致各种危机和冲突的产生。

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将少数民族的利益排除在外，这一点很重要。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对少数民族群体产生歧视心理，当然，对汉族人也不要歧视。还有一点尤其重要，

就是要保护好中国社会现有的公正的资源分配原则，不仅要保证汉族代表，也要保障少数民族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的公正途径的畅通。

中国是一个伟大和强大的国家，中国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对自己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包括汉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承认这种多样性的存在并支持多样性的发展是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团结起来的必要因素。

【论 文】

民族视野下的历史：从俄罗斯帝国到苏维埃国家¹

励 轩²

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进入了民族主义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为国家建构的基本原则。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在 19 世纪有意无意地遵循这一原则，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成功构建有助于统治精英对本国民众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用于抵抗外来侵略甚至是发动对外侵略。然而，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成功转型为民族国家。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中均未获得成功。

俄罗斯帝国为了应对民族主义时代带来的剧变，从 19 世纪中期起逐步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由分而治之转变为同化政策，压制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甚至是境内穆斯林群体的语言和文化，试图构建一个民族国家。但这种同化政策加速了境内非俄罗斯裔民族对沙皇俄国政权的不满，导致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非俄罗斯裔民族的分离倾向加剧。1917 年二月革命后，沙皇退位，临时政府废除了沙皇政权所建立和实施的有助于压制非俄罗斯裔民族分离的机构和措施。部分地方的非俄罗斯裔精英迅速组织起来填补了权力真空，并在虚弱的临时政府时期和动荡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初期，掀起了分离主义浪潮，沙皇俄国留下的庞大版图瞬间瓦解。

布尔什维克政权成立后，放弃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想法。党的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不仅公开主张民族自决，还设计了一整套旨在保障和鼓励非俄罗斯裔民族权利的制度，比如设置民族领地，鼓励民族语言在民族领地内的使用，提拔民族干部，支持民族文化的发展，实行联邦制，推动民族间经济平等化，短暂限制俄罗斯裔移民非俄罗斯裔民族领地。这些民族政策帮助布尔什维克政权迅速赢得了非俄罗斯裔民族政治精英的支持，促成新政权在短期内大致恢复了沙皇留下的版图。在 1920 年至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苏联众多非俄罗斯族裔享有着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都无法比拟的良好待遇。他们拥有自己的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他们的语言在自己的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是官方语言并且处于强势地位；民族干部得到空前重视，不仅在本民族领地内担任一把手和其他要职，还涌现了非俄罗斯族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大量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非俄罗斯族裔民族相比，此时的俄罗斯族裔反而受到了“歧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然而却并没有被机构化，既无自己的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无自己的共和国党中央，其拥有的权力和资源远远小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甚至无权决定本共和国领土的转让。生活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大量俄罗斯族裔公民还要被迫学习命名民族的语言，这让部分俄罗斯族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3 年 9 月 13 日第 8 版。

²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

裔公民对苏共的政策产生了不满。而对苏联来说，危害更大的则是来自民族边界的固化。自从实行苏联式肯定性行动后，族裔性对于苏联的普通公民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区分我族和他族并将这种区分延续下去变得极为重要。

作为苏联民族政策的设计者，斯大林似乎看到了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并试图进行修正。当世界进入上世纪 30 年代，国际局势的发展对苏联越来越不利，他越来越感到团结国内民众特别是俄罗斯族裔的必要性。在这个背景下，他于 1933 年暂停了已推行十余年的本地化政策（即在民族领地内的党政机关、国有机构重用民族干部并鼓励或要求任职的俄罗斯族裔干部学习地方文化），批评并撤换了他认为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乌克兰党政领导层。出于备战或战争需要，他还将境内部分他所认为的亲德或亲日的民族，比如日耳曼人、朝鲜人、车臣和印古什人等，迁徙到远离边境的地区。然而这种修正虽然缓解了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却并未打破苏联的族群固化，族裔性依旧是一个事。

同时，斯大林对苏联国家体制的改革，也将非俄罗斯裔民族甚至是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引向苏联的党和国家。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斯大林放弃了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新经济政策，代之以全面的计划经济。随之而来的还有政治权力集中化，原先设计的联邦制名存实亡。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党和政府成为了可以掌管一切事务的机构。但是恰恰这种集权模式，将各个民族的不满都引向了党中央和苏联政府。乌克兰党政领导人向联盟中央请求给与乌克兰更多的自主权力时，遭到了清洗；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党政领导人向联盟中央透露出制度化俄罗斯联邦的愿望时，也遭到了清洗。苏联境内所发生的每一起民族冲突都能找到党和政府的身影，即使他们的本意是维护民族团结与和谐，但是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并不领情，还会将党和政府视做镇压者。所有这些痛苦或自认为痛苦的经历虽然不能马上演变成民族起义，但却变成了一种记忆，在几十年后被人重新拾起。

尽管斯大林给大量俄罗斯族裔公民和非俄罗斯族裔公民都带来过痛苦，但不可否认，他所推行的肯定性行动以及之后的修正确实有助于苏联民族关系维持表面的平静。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民族矛盾在文献上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赫鲁晓夫甚至自豪地宣称苏联已经成功解决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但这并不标明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外界并不容易知道苏联民族冲突的存在。

【时事评论】

普京的族裔难题¹

方 亮

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其他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传统居住的领土。今日俄罗斯人再次表现出这种苗头，这已经与国际舆论探讨多年的“二次解体”暗合。

7 月，俄罗斯三大舆论调查机构之一“列瓦达中心”给出一份调查结果：51%的俄罗斯人不反对车臣脱离俄联邦，只有 10%认为应该使用各种手段阻止车臣独立。遥想两场车臣战争的年代，俄罗斯人对国家与本民族的认同达到苏联解体后的高峰，恐怖袭击带来的切肤之痛，以及经济困

¹ 本文刊载于《南风窗》2013 年 8 月 28 日-9 月 10 日第 18 期，总第 496 期，第 80-81 页。

顿、社会失序带来的窘迫，都激发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民族心理背景也正是普京发动第二场车臣战争并以此胜利作为自己君临天下保证的原因。

如今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大变，让人恍如隔世。若昨日重现，普京还会用战争换取支持率么？

指向异族

这些年，类似“停止喂养高加索！”这样的口号在俄罗斯人中间频繁出现，它们甚至成为几次大规模集会的主题。而反少数族裔移民（尤其是高加索移民）的事件则层出不穷，不但有新近的普加乔夫市反高加索移民抗议，更有去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最高长官特卡乔夫公开发表的反高加索移民言论。这些都说明，“列瓦达”的调查结果并非偶然。

另一家著名调查机构“全俄社会意见研究中心”的主任瓦列里·费多罗夫，从4个维度来界定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民族、领土、宗教、政治。俄罗斯人对车臣问题及包括车臣人在内的高加索少数族裔的态度，间接展现了俄罗斯人在前三项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俄罗斯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民族属性，排斥少数族裔，而东正教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区分“族类”的重要标准。苏联解体时，大片领土的丧失成为一代俄罗斯人的惨痛记忆，但如今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却愿意放任车臣自行独立。

什么样的人才算一个俄罗斯人？“列瓦达”去年12月给出一份调查报告：85%的人认为他应该出生在俄罗斯并且一辈子在俄生活，88%的人认为他应该拥有俄罗斯国籍，87%的人认为他应该讲俄语，69%的人认为他应该是东正教徒。最有趣的是另一个数字：81%的人认为他应该尊重现行政治制度。

这给人一种感觉，俄罗斯人的爱国仍主要受官方影响，而非如西方民族主义发端中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共同体观念。“列瓦达”负责人古德科夫认为，这组数字说明了俄罗斯社会发展不够成熟，国家挤压社会现象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指向相反方向的一些事实，比如那句“停止喂养高加索！”对少数族裔的反对固然是其重要背景，但走上广场的那些民众将矛头指向了克里姆林宫每年拿出巨额资金供养车臣的做法。在俄罗斯人自己尚且生活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慷慨让人感觉权利受到了侵害。这种基于公民权利的民族主义表达让人耳目一新，尽管尚只是萌芽。

这种官方宣传背景下的国族认同，恰恰同51%的人不反对车臣脱离俄联邦的数字构成了鲜明对比。俄罗斯人对国家的高度认同这一事实，直接与对某些少数族裔的反对迎头相撞，这一矛盾甚至干扰了俄罗斯人对领土范围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本族反对异族的思潮，难免将直接造成民族关系紧张，加上领土认同上的异动，导致俄罗斯领土再次缩水也并非不可能。

历史包袱

费多罗夫列举了多种俄罗斯国家民族认同中的问题，包括以苏共为代表的俄罗斯人认同苏联政权的倾向。但一番梳理下来，可以清晰看到俄罗斯认同体系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仍是民族间关系问题，俄罗斯族人对本民族和本国的认同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俄罗斯族人对本民族的认同，从基辅罗斯时代起就打下了坚实基础。从那时起，东正教就成为加强国族认同的重要支柱。经过历代沙皇时期，这种认同已深入骨髓，即便遇到苏联时代排斥东正教的政策，这个民族依然可以用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战胜希特勒这样的强敌。

所以，不论新时代俄政策走向及国家发展程度如何，这种强大的爱国爱族思潮都不会轻易减弱，更何况叶利钦和普京政权继续了用舆论影响民众观念的做法，普京更是连续多年作为爱国主

义者的精神寄托而被崇拜。

但是，俄罗斯族这个核心民族与以高加索人为代表的持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习俗和语言的少数族裔关系的问题却被遗留下来。这个问题在沙皇时代就尖锐呈现，在苏联时代虽被掩盖却从未消失。

沙皇时代，民族问题历来只有两种解决方式：铁血消除民族多样性或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建立统一民族。前者往往招致恶果，比如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刺。后者往往是在国家面临较大压力时的选择，比如尼古拉一世时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这三位一体的用来统一各民族认同的口号。当时，他正面临外有强敌、内有起义、经济困顿、政治不稳的窘境。

尼古拉一世的尝试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用统一意识形态化解民族间矛盾的尝试，第二次便是苏联推出的“苏联人”模式。这种模式也诞生于内忧外患中，那便是十月革命后面对干涉军的围剿，列宁出于争取各少数民族支持的需要，承认各族权利，甚至是未来退出联盟的权利。此后，苏联的民族政策便是典型的“套娃式”政策：在“苏联人”下套着各个民族。结果，帝国一朝解体，国家也按照民族划分分崩离析。赫鲁晓夫所称的苏联已经培养出“苏联人”民族的说法成为笑谈。

二次解体？

俄罗斯人从未能解决民族认同这一痼疾。苏联解体倒算是为俄罗斯卸了包袱，但眼前的包袱也并不轻松。在车臣地区，99%的居民都是车臣人，他们甚至在格罗兹尼议会公开讨论出台加强伊斯兰教色彩的法案。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民族问题虽不如苏联那么严重，但若真闹起来，也足够震荡整个俄罗斯。

今年早些时候，“全俄社会意见研究中心”以“俄罗斯面临的重大威胁”为主题搞了一项调查，排名第一的便是移民，选择它的民众达到35%。媒体大多将这一调查结果与俄存在已久的对高加索移民的反对联系起来。其实，正如媒体所言，俄罗斯族的排外与许多欧洲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的反对并无二致。但问题是，高加索是俄罗斯领土，对这块领土上的民众进行反对，其结果很难预料。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对苏联解体的那段历史进行再次审视。一个颇为刺眼的事实是，苏联民众在意识到国家即将解体时并未走上街头抗议，反倒是在8·19事件中保守派意欲逆转民主改革时走上街头表达意见，甚至不惜流血牺牲。整场苏联解体造成的人员死亡就出现于那次对民主道路的捍卫中。这一强烈的反差恰恰反映出一个事实，**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真他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传统居住的领土。俄罗斯族的这种抛弃与苏共精英对苏共的抛弃异曲同工。**

所以，今日俄罗斯人再次表现出这种苗头，不可能不让普京感到担忧，因为这已经与国际舆论探讨多年的“二次解体”暗合。

正因此，今年稍早前，普京命令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战略。此举被美国安全智库 Stratfor 称为俄历史上用统一意识形态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三次尝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其即将举行的10周年年度会议的俄方主要专家成员、未来组辩论成员费多罗夫认为，普京的这次部署是俄新时代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然而，普京不肯放弃车臣领土的指导思想，决定了这一官方部署会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作为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之一，东正教拥有自己培养的武装护教力量；车臣人结婚时则需要朝天鸣枪作为庆祝，他们甚至不顾俄人反对将这一出搬到克里姆林宫外。普京试图调和这两者，曾称应尊重宗教感情但俄是世俗国家，可在今年4月原籍车臣的两名嫌犯制造波士顿爆炸案前后，莫斯科一反常态在相关事务上与美执法部门紧密合作，再次将俄国内这种分歧暴露于世。显然，要避免苏联解体的逻辑在俄罗斯重演，普京正面临逆水行舟般的挑战。

【文献介绍】

中亚之外苏维埃穆斯林的历史编撰学

励 轩¹

摘要：这篇报告介绍了 15 本关于生活在中亚之外的沙俄和苏联穆斯林的英文学术著作。这些书聚焦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鞑靼人，阿塞拜疆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达吉斯坦人。它们涵盖了这些族群的历史，民族构建过程以及与俄罗斯人的冲突。通过对这些著作的检视，学者们能够了解这些穆斯林是如何在沙皇俄国和苏联生活的。

自从 16 世纪以来，生活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外的穆斯林已经在俄国和苏维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Ismail Gaspirali）发动了贾迪德运动（Jadidist movement），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改革。曾经困扰过沙皇俄国的北高加索穆斯林在苏联崩溃之后，再度因其与族裔俄罗斯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困扰着俄罗斯联邦。进一步的，对中亚之外穆斯林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和苏维埃政治和社会历史。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流放史的调查有利于我们了解苏联民族政策和它的结果。对阿塞拜疆独立运动的检视帮助我们获知沙皇俄国和苏联崩溃的原因。在这篇论文中，我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涵盖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外主要穆斯林族群的历史编撰学。这些书将会涉及我所提到过的主题。

谢林·阿金纳（Shirin Akiner）的《苏联的穆斯林》（*Islamic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是一本关于苏维埃穆斯林的概述。阿金纳尝试去回答三个关于苏维埃穆斯林的基本问题：他们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有多少人。首先，她介绍了苏联民族政策和苏联的伊斯兰历史。接着她提供了每一个苏维埃穆斯林族群的背景、人口、分布、语言和政治经济地位等信息。在书的结尾，阿金纳还增加了关于苏联操突厥语非穆斯林群体的附录。阿金纳勾勒了一幅极端多样化的苏维埃穆斯林图画。应该说，她的基本目标实现了。在读过这本书之后，读者将知道苏维埃穆斯林的种类、数量和分布。

阿兰·费舍（Alan Fisher）的《克里米亚鞑靼人》（*The Crimean Tatars*）是少有的几本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英文学术专著。费舍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同时还是一位世界著名的鞑靼历史专家。《克里米亚鞑靼人》是他最知名的著作。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费舍遵循了严格的年代学原则。他将这本书划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费舍追溯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起源、克里米亚汗国的建立、汗国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文化生活。在第二部分，费舍描绘了俄罗斯帝国是如何侵略克里米亚汗国，以及之后对汗国的吞并和管理。在第三部分，他提供了一个生活在苏维埃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形象。该书结束于 1970 年代早期。

费舍用了大量鞑靼文、土耳其文和俄文数据，使得该书在文献使用上具有了很高的可信度。进一步的，这也是第一本涉及到克里米亚鞑靼人“首次出现在克里米亚”的英文学术著作²，对

¹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

² Alan Fisher, *The Crimean Tatar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p. xii.

于想了解克里米亚鞑靼人早期历史的人来说很有意义。

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费舍也有一本关于同主题的论文集《在俄罗斯人，奥斯曼人和突厥人之间：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人》(*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这本书包括了费舍出版于1967年至1988年的十篇论文。这本论文集有助于读者了解费舍研究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学术历程。在第一篇论文中，费舍分享了他的奥斯曼文献目录。第二篇论文是相关档案文献的指引。在第三篇论文中，他检视了16世纪奥斯曼人和克里米亚人的关系，他认为“把克里米亚当作鞑靼人的‘鸟巢’或奥斯曼人的军事基地这种过分简单的观念必须被修正过来”¹。在第四篇和第五篇论文中，费舍用了与克里米亚半岛奥斯曼人财产相关的奥斯曼文献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克里米亚哪些部分处于奥斯曼人控制之下，还有哪些部分处于克里米亚汗控制之下。在第六篇论文中，他检视了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汗国的过程。他认为女沙皇叶卡捷琳娜(Tsarina Catherine the Great)在1782年之前并无把该汗国合并进俄罗斯帝国的意图。相反，在合并之前，叶卡捷琳娜一直支持改革家萨辛·吉拉尹(Sahin Giray)汗去统一克里米亚。在第七篇论文中，通过克里米亚鞑靼人这个案例，费舍探索了19世纪族裔俄罗斯人和穆斯林的关系。他想去解释一个悖论：19世纪的鞑靼人经历了严重的俄罗斯化，但是在1920年代俄国却“成功发展和维护民族共产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强调鞑靼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¹。在第八和第九篇论文中，他介绍了一位鞑靼名人的一生：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Ismail Gaspirali)。加斯普拉里开启了一个伊斯兰改革运动：贾迪德主义(Jadidism)。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费舍回顾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评价了他们的现状。他认为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边缘地位给他们带来了不幸，他们一直面临着可怕的未来。

费舍并没有聚焦于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认同形成至关重要的流放。在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应该是布兰恩·威廉姆斯(Brian G. Williams)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The Crimean Tatars: the Diaspora Experience and the Forging of a Nation*)。威廉姆斯是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伊斯兰历史教授，他也从事奥斯曼历史研究。威廉姆斯书写了从史前时期到当代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历史。他专注于克里米亚鞑靼人处于俄国和苏维埃统治下痛苦的迁徙和流亡史。这本书开始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起源。接着，威廉姆斯讨论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人的逐渐接触以及之后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他强调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土著，从而认为俄国对克里米亚的统治是殖民。然后，威廉姆斯描述了19世纪以来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对外移民。他认为克里米亚鞑靼人从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向外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保存他们的伊斯兰认同。他也试图解释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认同的构建并把这种构建归因于多个因素，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亡经历、西方思想的冲击、改革家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及其追随者的影响、鼓励民族文化的早期苏维埃政策的作用。威廉姆斯的书结束于克里米亚鞑靼人1990年代从中亚回归到克里米亚以及回归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威廉姆斯使用了大量的俄文、土耳其文和其它西语数据。他也使用了不少的一手数据，诸如旅行者的记录、苏联内务部文件、和幸存流放者的访谈、克里米亚鞑靼人民谣等。

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格瑞塔·林·尤林(Greta Lynn Uehling)的《超越记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回归》(*Beyond Memory: The Crimean Tatars' Deportation and Return*)也覆盖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回归史。尤林探索从未在克里米亚半岛生活过的第二代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如何变得愿意离开中亚以便回到他们历史上的故土。她按照年代学原则组织了这本书。该书始于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概况的介绍，刻画了俄国的占领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之后又着手于他们在中亚的生活，接着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对1944年流放集体记忆的形成以及他们最后的回归。相比于威廉姆斯的《克里米亚鞑靼：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尤林这本

¹ Alan Fisher, *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 Tatars*, Istanbul: The Isis Press, 1998, p.41.

书的历史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显得很简单和薄弱。但在书的最后四章，尤林做得很好，她记录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回国定居的生活。

尤林用了很多她自己的田野调查记录去证明克里米亚鞑靼人一直维系的对克里米亚及那段流放经历的集体记忆影响了他们回到克里米亚的渴望。虽然在这本书中，她也引用了很多俄文和鞑靼文资料。然而，她对鞑靼文的不熟练导致了某些错误。比如她在书中把 Azat Krym（自由克里米亚）误译成了 Red Crimea（红色克里米亚）。

阿扎德-阿耶斯·若立希（Azade-Ayse Rorlich）的《伏尔加鞑靼人：民族复兴的剪影》（*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研究了另一个鞑靼族群——伏尔加鞑靼人的历史。若立希是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和斯拉夫语言与文学教授。他的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伏尔加鞑靼人历史研究的英文著作。若立希探索“公元 10 世纪以来伏尔加鞑靼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²。她把全书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她刻画了伏尔加鞑靼人的早期历史，开始于他们的起源，接着讲保加尔国家建立、蒙古人征服，最后是卡赞汗国（Kazan Khanate）创建。在第二部分，若立希探索了处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伏尔加鞑靼人生存状况。她认为俄国的政策致力于伏尔加鞑靼人的俄罗斯化。她也探索了一场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改革家重新评价了宗教思想并且接受了伏尔加鞑靼人的世俗化。若立希吸收了自己博士论文³的很多内容到第二部分。在第三部分，若立希检视了二月革命后的伏尔加鞑靼人，探讨了革命后发生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二战后他们的文化复兴。

若立希在书中用了大量的俄文、土耳其文和鞑靼文资料。她覆盖了与伏尔加鞑靼人有关的每个重要问题，从宗教到教育再到族群认同。总而言之，这本书对于想要了解伏尔加鞑靼人历史的读者来说将会非常有帮助。

阿塞拜疆人是苏联中亚地区之外最大的穆斯林族群。在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形成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塔德伍兹·苏维艾特施瓦斯基（Tadeusz Swietochowski）的作品。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是蒙莫斯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是中东和阿塞拜疆现代史专家。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的《俄国的阿塞拜疆 1905—1920：一个穆斯林社会民族认同的塑造》（*Russian Azerbaijan 1905–1920: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 Muslim Community*）尝试去探索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想法的诞生以及阿塞拜疆集体认同的创造。他聚焦于从俄国 1905 年革命到 1920 年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之间的阿塞拜疆历史。首先，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简要介绍了革命前俄国的统治。然后他探索了革命和阿塞拜疆人的政治觉醒。接着他花了四章描述在十五年内阿塞拜疆民族-国家的想法如何变为现实的。最后，他探讨了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苏维艾特施瓦斯基专注于在此期间统治精英以及阿塞拜疆知识分子重构政治运动的想法。他认为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源自阿塞拜疆精英与根植传统的普通大众之间的脱节，另外，这一失败还在于他们在选择亲近俄罗斯还是土耳其方面的混乱。

由于难以获得在苏联的档案，苏维艾特施瓦斯基使用了大量来自大不列颠公共记录办公室（Public Record Office of Great Britain）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这本书对于想要了解 20 世纪初阿塞拜疆历史的读者来说非常值得一读。

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的另一本书《俄罗斯和阿塞拜疆：转型中的边疆》（*Russia and 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聚焦于俄罗斯—伊朗边界的两个阿塞拜疆。他试图谈论两个阿塞拜疆有什么共同点以及“比起外国的征服，是什么力量更深远的使他们分离”⁴。在第一章，苏维艾

¹ Ibid., 123.

² Azade-Ayse Rorlich,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 xv.

³ Azade-Ayse Rorlich, *Transitio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form and Secularization among the Volga Tatar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ress, 1976.

⁴ Tadeusz Swietochowski, *Russia and 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特施瓦斯基探索了发生在俄罗斯征服阿拉斯河（Araxes）北岸后阿塞拜疆行政和经济转变。在第二章，他讨论了与欧洲的联系对阿塞拜疆知识分子的影响。之后，他探讨了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对两个阿塞拜疆的影响，包括俄国阿塞拜疆的独立以及伊朗阿塞拜疆的自治。在第五章，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描述了俄罗斯阿塞拜疆的苏维埃化以及伊朗巴列维王朝对伊朗阿塞拜疆的统治。当苏维埃阿塞拜疆被民族化和苏维埃化的同时，巴列维政府对伊朗阿塞拜疆采用了同化政策。苏维艾特施瓦斯基认为 1920 年代的新变化事实上扩大了两个阿塞拜疆的鸿沟。在第六章，他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对伊朗阿塞拜疆的占领以及自治阿塞拜疆在伊朗的再现。接着，他探索了伊朗阿塞拜疆自治的陷落以及苏联和伊朗如何试图去隔绝两个阿塞拜疆以及如何重启在各自阿塞拜疆的同化政策。最后，该书终结于苏联崩溃后一个独立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建立。

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援引了大量来自苏联阿塞拜疆的书籍、档汇总、文章等，他还使用了不少来自阿塞拜疆国家档案馆的阿塞拜疆文和俄文文献。此外，他也利用了大不列颠公共记录办公室、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波兰外交部档案馆的文献。档案数据的充分使用保证了该书观点经得起检验。总之，这是一本关于两个阿塞拜疆历史的可靠研究成果。

除了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的书，安迪·阿尔斯塔德（Audrey L. Altstadt）的《阿塞拜疆突厥人：俄国统治下的权力和认同》（*The Azerbaijani Turks: Power and Identity under Russian Rule*）研究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诞生、阿塞拜疆人和俄国及苏维埃当局的互动及其结果。在该书开头，她介绍了阿塞拜疆突厥人的起源，之后介绍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俄国的殖民统治以及它对阿塞拜疆的影响，接着她描述了阿塞拜疆人对俄国殖民统治的反应。她解释了俄国是如何侵略阿塞拜疆以及如何在那里建立殖民管理制度的，她也探讨了阿塞拜疆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紧随其后，阿尔斯塔德检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她认为沙皇的阿塞拜疆政策是压迫性的，这些政策引起了阿塞拜疆人的不满。进一步的，阿尔斯塔德描述了短命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的到来。此后，阿尔斯塔德追溯了巴希洛夫（Baghirov）统治下的阿塞拜疆。全书结束于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时期。在最后一部分，她讨论了阿塞拜疆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应对，探索了阿塞拜疆人是如何利用改革争取民族权利的。

阿尔斯塔德对阿塞拜疆和俄国及苏联中央政府近两个世纪来复杂关系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阿尔斯塔德对众多俄文和土耳其文文献的使用令人影响深刻。这使得书中她对如此之长的阿塞拜疆历史的检视很有说服力。

如果了解阿塞拜疆的简史，可以参阅查尔斯·范德柳（Charles van der Leeuw）的《阿塞拜疆：对认同的寻找》（*Azerbaijan: A Quest for Identity*）。这本书始于古代阿塞拜疆，结束于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总统时期。范德柳描述了阿塞拜疆历史上几个重要的事件，包括蒙古人统治、俄罗斯入侵、苏维埃时代和国家独立。他试图通过对阿塞拜疆历史的检视来定义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概念。范德柳暗示阿塞拜疆自古以来一直是个独特国家和永恒不变的，尽管这并不客观。事实上，正如书中所说，阿塞拜疆历史上遭受过数次入侵和异族统治。

虽然范德柳在利用阿塞拜疆文去构建历史方面值得称赞。然而，他的参考文献不够充分。在书中，他未能就很多史实提供足够多的脚注。更糟的是，书中还有不少事实性错误。比如，他把古代波斯神职人员（Magi）当作了马扎尔人（Magyars），后者事实上是生活在匈牙利的一个族群¹。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这些错误使得该书减少了应有的价值。

苏哈·伯路巴斯（Suha Bolukbasi）的《阿塞拜疆政治史》（*Azerbaijan: A Political History*）试图重构前苏维埃时期以来的阿塞拜疆政治史。然而，这本书的结构是不够合理的。伯路巴斯把前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阿塞拜疆压缩为两个章节，却用了全书七个章节中的四章来检视 1987 年以来山地卡拉巴赫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在书的开始，伯路巴斯探索了卡拉巴赫问题的

1995, p. vii.

¹ Charles van der Leeuw, *Azerbaijan: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42.

根源。他认为当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坚称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阿塞拜疆人是新来者时，阿塞拜疆学术界对苏维埃理论——阿塞拜疆人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拥抱强化了阿塞拜疆人对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他解释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卡拉巴赫问题如何在亚美尼亚人的发起下重新出现，他也解释了阿塞拜疆政治精英如何努力阻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从阿塞拜疆脱离。进一步的，他介绍了莫斯科如何干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以及阿塞拜疆对莫斯科干预的反应。这本书结束于阿塞拜疆失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伯路巴斯认为阿塞拜疆共产党对政治反对派的限制以及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民族军导致了1990年代早期阿塞拜疆丧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伯路巴斯在这本书中没有充分使用一手数据，这降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此外，书的结论部分与伯路巴斯主要关心的卡拉巴赫问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另一本聚焦于阿塞拜疆的作品是施瓦特·康奈尔（Svante E. Cornell）的《独立之后的阿塞拜疆》（*Azerbaijan since Independence*）。在这本书中，康奈尔探索了阿塞拜疆内外问题中的复杂性和交互性。首先，他介绍了从前苏维埃时期到现在的阿塞拜疆历史。接着他以专题方式讨论了阿塞拜疆的内部问题，包括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最后，康奈尔专注于阿塞拜疆与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及西方的外交关系。他比较了1918-1920年期间阿塞拜疆的第一次独立和苏联崩溃后的第二次独立。他认为前苏联官员盖达尔·阿利耶夫在苏联崩溃后能够重新恢复他在阿塞拜疆的权威是因为知识分子未能解决阿塞拜疆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他也探索了阿塞拜疆当今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失衡的经济及腐败。他建议阿塞拜疆领导人应该在处理腐败方面投注更多的关注。

康奈尔使用了不少俄文和阿塞拜疆文文献，尽管他严重依赖关于阿塞拜疆的英文学术著作。此外，在这本书中，人们也很容易辨识出康奈尔的亲阿塞拜疆立场。他称阿塞拜疆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民主和世俗的共和国。他也表达了对阿塞拜疆独裁者、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的支持。

北高加索是诸如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等大量苏维埃穆斯林所生活的另一个地区。乔治·安施巴德兹（George Anchabadze）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The Vainakhs*）是关于北高加索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一本介绍性作品。安施巴德兹是格鲁吉亚大学伊利亚州立大学（*Ilia State University*）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是高加索历史地理学和高加索人历史。在这本书中，他以紧凑的书写方式探索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历史和现状。这本书覆盖了车臣和印古什文化的演进以及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还包括了对高加索及其人民的历史地理描述。首先，安施巴德兹介绍了高加索的土地和人民，并且专门介绍了车臣和印古什的地理。接着，他检视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历史，从他们的起源到俄国对车臣和印古什的征服再到伴随苏联崩溃的车臣独立。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安施巴德兹介绍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和第一次车臣战争。本书结束于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开始。

安施巴德兹利用他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丰富的知识，从而帮助高加索之外的人能够接触他们的历史。他使用了俄文和高加索文献描绘了一段悠久的车臣、印古什历史。最终，这本书不仅成为普通公众了解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工具，也成为这个领域中对专业学者颇具学术价值的参考书。

如果想深入了解车臣人和族裔俄罗斯人之间冲突，请参阅罗伯特·西里（Robert Seely）的《俄罗斯-车臣冲突，1800-2000：致命拥抱》（*Russo-Chechen Conflict, 1800-2000: A Deadly Embrace*）西里努力重构俄罗斯和车臣之间的苦难史。他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车臣战争会爆发以及战争对俄罗斯的影响。他认为俄罗斯和车臣政治家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西里把全书划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他描述了俄罗斯人和车臣人首次接触以来的主要事件，他解释了为什么车臣人对俄罗斯国家抱有深深敌意。他认为俄罗斯对车臣的殖民化引起了车臣人的反抗。在第二个部分（第五章-第十章），西里探寻了1994-1996年车臣战争更直接的原因。他认为在莫斯科的政治角力，特别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和车臣人如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影响开战决定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西里也检视了俄罗斯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角色。他认为不太成功的战争降低了俄罗斯领导人的信誉，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叶利钦试图削弱宪法权威性使自己成为独裁者的担忧。

我想介绍的最后一本书是罗伯特·布鲁斯·怀尔(Robert Bruce Ware)和埃文·吉斯利夫(Enver Kisriev)的《达吉斯坦：俄罗斯在北高加索的霸权和伊斯兰的反抗》(*Dagestan: Russian Hegemony and Islamic Resistance in the North Caucasus*)。怀尔是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德斯维尔分校(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Edwardsville)哲学教授，他也是达吉斯坦事务的专家。吉斯利夫是俄罗斯科学院文明化和地区研究中心的达吉斯坦社会学家。在这本书中，怀尔和吉斯利夫试图去探索为什么达吉斯坦如此不稳定。他们介绍了 Djamaat (地方小区结构)概念。他们视 Djamaat 为维持达吉斯坦不同族群间和平与宽容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他们认为，不像他们的邻居车臣，由于协商式的 Djamaat 有助于不同族群间集体权力的分享，民主达吉斯坦在 1990 年代一直维持着稳定。他们觉得 Djamaat 是跟权力集中相悖的。然而，普京总统的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方自治的颠覆，并且使得达吉斯坦不同族群间的权力分享结构流产。这种改变引起了达吉斯坦人的不满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增长。最终，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增长又增加了达吉斯坦的动荡。

作为少有几本关于达吉斯坦的英文学术著作之一，这本书为想了解达吉斯坦国内冲突及其内部原因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怀尔和吉斯利夫却忽略了外部因素。他们并没有澄清车臣战争是否影响了达吉斯坦的稳定。

虽然我在这里所介绍的一些书在利用一手数据方面并不完美，但是他们仍然是关于中亚之外苏维埃穆斯林研究方面不错的指导性书籍。每本书后的参考文献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此外，大多数作品都使用了非英文文献，诸如俄文、土耳其文、鞑靼文、阿塞拜疆文和各种北高加索文。这使得未能掌握这些语言的学者通过可以通过所提及的英文作品接触到可靠的历史。

参考文献：

- Akiner, Shirin. *Islamic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3.
- Altstadt, Audrey L. *The Azerbaijani Turks: Power and Identity under Russian Rul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2.
- Anchabadze, George. *The Vainakh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sisana Paichadze. Tbilisi: Caucasian House, 2001.
- Bolukbasi, Suha. *Azerbaijan: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 Cornell, Svante E. *Azerbaijan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M. E. Sharpe, 2011.
- Fisher, Alan. *The Crimean Tatar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 Fisher, Alan. *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 Tatars*. Istanbul: The Isis Press, 1998.
- Leeuw, Charles van der. *Azerbaijan: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Rorlich, Azade-Ayse.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 Swietochowski, Tadeusz. *Russian Azerbaijan 1905-1920: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 Muslim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wietochowski, Tadeusz. *Russia and 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eely, Robert. *Russo-Chechen Conflict, 1800-2000: A Deadly Embrace*. New York: Frank Cass, 2004.
- Uehling, Greta Lynn. *Beyond Memory: The Crimean Tatars' Deportation and Re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Williams, Brian G. *The Crimean Tatars: the Diaspora Experience and the Forging of a Na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1.

【时事评论】

战略失策与巴沙尔的命运¹

于海洋²

地中海之滨，戈兰高地之侧，一片古名为苏利斯顿（玫瑰之地）的土地曾无数次被征服者的铁蹄蹂躏，殉难者的鲜血把大地涂成玫瑰的颜色。今天被称为叙利亚的古老国度宛如陷入了无止无休的诅咒，古代征服者战马的嘶声未远，新的世界帝国的雷霆之怒又再次逼近。9月4日，美国参议院的授权启动了美利坚庞大的军事机器，被两年内战折磨得已经疲惫不堪的巴沙尔政权可否维系？在许多人眼中，纵横“玫瑰之地”半个多世纪的阿萨德家族已经宛如斜阳晚照，时日无多。对比老阿萨德时代的荣光与权势，半途出家的巴沙尔可谓时运不济。是什么使阿萨德家族的两任统治者命运相差得如此悬殊？时代的变化、人心的向背，这些当然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父子二人战略视野的差距，其实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很多媒体报道相反，巴沙尔与乃父老阿萨德在内政方面的差距其实并不太大。在2011年内战爆发前，巴沙尔其实从未对叙利亚传统的内政结构作出任何改变，所有的改革传言甚至包括他改革之志未遂的说法几乎全都查无实据。除了阿萨德家族的第二代们更全面地掌握了叙利亚各行各业大权外，叙利亚在巴沙尔执政的岁月里依然如旧时无二。巴沙尔的亦步亦趋虽没有缓解国内积累已久的矛盾，但也不会使矛盾真正爆发。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刺激和诱发，叙利亚这颗埋藏许久的老炮弹是不可能被装上引信的。而真正使外部环境发生巨变的，恰恰是巴沙尔唯一自以为是的，改变乃父信念和主张的地方，那就是他对大叙利亚战略的彻底抛弃。

说起来，叙利亚即便在老阿萨德执政时期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强盛。无论是巴以战争还是黎巴嫩冲突，叙利亚军队在战场的表现从来都是惨不忍睹。但是这支从未取得过胜利的军队却一直在享受胜利的果实，老阿萨德的心机智谋确实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老阿萨德还有他的复兴党最大的弱点在哪里？不是专制，这在阿拉伯世界很普遍，也不是贪腐不擅经济，而是人少式微复兴党的民众基础，即占全国人口11%的穆斯林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既和逊尼派势如水火，也和伊朗的主流什叶派区别很大，还和黎巴嫩的基督教恩怨纠缠了近千年。孤立的阿拉维民众要不是因为自古彪悍善战，后来被法国殖民者大量吸收进军队，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执政力量的。好战、教义独立且无法与叙利亚主流的逊尼派达成妥协，这才是复兴党统治不稳的问题所在。

复兴党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在火山口上，警惕地注视着逊尼派可能的反扑，他们永远不可能占据稳固的优势，因此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寻找外部强援。这就是经济上从未成为中东大国的叙利亚却总是出现在中东各大战场上的原因。只有深度介入地区安全局势让所有人有求于己，才能让邻居们把试图干预叙利亚内部事务的手缩回去。基于战略原因，老阿萨德选择了冷战时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成为俄罗斯维持在地中海声望的唯一基石。基于宗教原因，老阿萨德选择了与伊朗和黎巴嫩的什叶派合作，尽管阿拉维派和正统什叶派还有所区别，但他们对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是空前一致的。作为阿拉伯人，老阿萨德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中从来不站在同胞一边，他用这种忠诚换来了今天伊朗对叙利亚战场的拼命维护。基于种族原因，老阿萨德选择了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对抗以色列。叙利亚在伊朗问题和宗教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13日第8版。

² 作者是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师。

问题上和沙特、阿联酋等国闹得不亦乐乎，但是它在对以色列战场上的牺牲又限制了这些国家对叙利亚逊尼派的同情之心。为了支援对以色列的圣战，叙利亚甚至战败失去戈兰高地。牺牲再牺牲，通过对俄罗斯、什叶派和阿拉伯世界贡献牺牲，孱弱的叙利亚把自己欧亚腹心之地的战略枢纽作用转化为切实的影响力和威望，老阿萨德与伊朗、黎巴嫩构筑了一条宽阔的“什叶派走廊”，与俄罗斯构筑了一条反美堤坝，与埃及一起构成了夹击以色列的双钳。复兴党领导下的叙利亚从没在阿以战场和黎巴嫩战场上取得过任何说得过去的战绩，但是，就凭着老阿萨德的纵横捭阖还有叙利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一个谁都承认的大叙利亚。有了大叙利亚，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欧美人、波斯人就被隔开了，地区得以安宁，局势不会无法收拾。老阿萨德构建的这个大叙利亚对他的盟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不会容许反对派将阿萨德家族拉下马来。复兴党被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拖得元气大伤，但国内的反对派却也永远是蠢蠢欲动又永远孤立无援。

巴沙尔也许不缺老阿萨德的权谋，但他一定没有老阿萨德的胆量。这个年轻时把精力都放在治疗眼疾上的新科总统，注定过不了乃父那屡战屡败、担惊受怕的日子。他渴望安定的天性使他从老阿萨德留下的境外战线上过快撤后，最后走上了其父一辈子都躲过去的最坏结果——在国内迎战自己的敌人。老阿萨德从没在以色列面前讨到过便宜，甚至丧师辱国亲手送给了戈兰高地天险。但是老阿萨德也用其一生的败而不服让以色列心生忌惮，从此对叙利亚的黎巴嫩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巴沙尔自执政以来从未在戈兰高地和反犹太复国方面表现出过任何兴趣，但此举换来的只是以色列忌惮的消失和他在阿拉伯诸国眼中利用价值的消失。对以色列人来说，安慰老阿萨德是本国边疆安全的需要，但是巴沙尔显然对边疆安全更加需要。对于沙特、阿联酋等国来说，这个信仰异端的国家甚至连牵制以色列的作用都没有了，那么叙利亚和逊尼派的恩怨就该清算了。他们因此开始大胆地资助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老阿萨德一生都不认为黎巴嫩是个独立的国家，他对黎巴嫩的军事和经济控制，使该地成为牵制巴解组织、以色列和美国的重要堡垒。黎巴嫩隔三差五的乱局总会吸引各方势力的关注，挑动大家在黎巴嫩较劲总比在叙利亚更有利。但是巴沙尔感到的只是疲倦和不堪重负，要知道天天在一个地方烧火还要保证不酿成火灾是很累的。2005年他宣布阶段性撤军之初很多人还以为这只是他的惺惺作态而已，到后来大家发现原来这位新总统是真的不喜欢黎巴嫩带来的诸多麻烦。如果不是同为什叶派联盟成员的伊朗填补空缺，这一鲁莽举措很可能使叙利亚的内战早爆发几年。因为有了黎巴嫩错综复杂教派纠纷的牵绊，无论美以联盟还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都可以全无顾忌地向叙利亚讨还旧债了。

没有了黎巴嫩，大叙利亚也就烟消云散了。没有了戈兰高地，叙利亚的发言权就降低了。今天的巴沙尔还能撑得下去，很大程度上不是马希尔领导的共和国卫队多能打，而在于老阿萨德留下的大叙利亚废墟还在勉强地支撑着外援施力相救。俄罗斯的军港和地中海存在，伊朗的“什叶派走廊”之梦，正是这些老阿萨德打出的牌，使今天的巴沙尔不至于完全孤立。但是，这些老朋友们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重视叙利亚了。因为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已经由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盟友，变成了一个哭哭啼啼每天等着援助的小伙伴。大叙利亚梦对于叙利亚而言是很辛苦的重担，但没了这层沉重的铠甲，叙利亚的对手们就可以轻易地把手伸到其脆弱的国内。这可能就是巴沙尔战略方面最大的失误了。

【时事评论】

伊朗人的棋盘

于海洋

9月15日，奥巴马在接收电视专访的时候，明确向伊朗提出了警告，美国没有发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并不意味着伊朗就是安全的。伊朗核问题是一个比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更严重的问题，美国不会坐视。很多媒体坚信正是这一警告使伊朗新登台的鲁哈尼政权在20号召开的第57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走出了更积极的让步：伊朗同意暂停丰度为20%的浓缩铀生产。

这种乐观其实是牵强的。它逻辑中最荒谬的地方就在于如果虚弱的叙利亚都能让奥巴马动武的誓言吞回去，那么站在叙利亚身后更强大的伊朗，奥巴马的军事威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美国极其盟友在叙利亚核问题上的表现几乎可以说的上是被全球舆论直播，从政府的强硬到民间的反战再到后来俄中协调和西方退步，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威望已经受到严重伤害。这种时候美国能指望伊朗做出什么妥协呢。道理明摆着，如果连美国武威极盛的小布什时代时都没法让伊朗在核问题上退步，今天美国军事上颓势已现，伊朗难道能把几乎到手的核权益再交回去？

如果全面考虑伊朗此时的局面，从1992年海湾战争开始，伊朗已经开始和美国开始下了一场事关中东未来变局的大棋局，如今棋局已到终盘，所谓核计划虽然没有成为核武计划，但是伊朗的志向和战略都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清醒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美国和伊朗的问题也许包含了核计划的内容，但它绝不仅仅是核问题。美伊两国矛盾的复杂性已经超过了一两个简单的目标，其中包括了势力范围的划分、战争红利的取舍、教派冲突与种族矛盾等多种问题。美国甚至无法公开承认，它才是伊朗走向强大的最大推手，而他与伊朗的最严重冲突在于伊朗不知感恩图报。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健忘和荒谬，伊朗在经历了穆斯林革命后在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中那是空前孤立，说起宗教，伊朗主政的是伊斯兰世界中受到压制的什叶派，而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政权又倾向于搞革命输出，弄得中东的什叶派政权无不侧目。说起种族矛盾，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斗争。说到政体，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一个空前古怪的政治体制，它既是中东地区选举体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因此和那些酋长国和君主国们格格不入，但它又是一个教权至上的神权国家，因此和代表阿拉伯世俗主义的复兴党政权们矛盾重重。一个异端的伊朗不为近邻所喜，又极端反美反犹。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没谁相信这个与一切敌对的新政权能活下去。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萨达姆下决心要由他充当这个英雄角色，最后使一场生灵涂炭的两伊战争爆发。

伊朗人在这场战争中证明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却无力打破被包围的国际政治现状，这个孤独的国家依然面临着被外部制裁和敌意慢慢绞杀的可能。要不是萨达姆的疯狂和老布什的沙漠风暴，伊朗的命运仍未可知。被萨达姆苦苦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借乱和伊朗结成了统一战线，被打得失了威望的复兴党政权们也纷纷和伊朗开始恢复关系。当时就对伊朗复兴满怀疑虑的老布什没有直接把萨达姆政权打垮，这种政治智慧勉强维持了对伊朗的地缘包围圈摇摇欲坠却不至于骤然崩塌。但是他的儿子却没乃父的那份心机，小布什灭亡萨达姆政权的举动彻底解放了伊朗。伊拉克的什叶派依靠伊朗的全面援助在伊拉克政坛占据了稳固的优势，包括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前复兴党政权们纷纷担心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噤若寒蝉，再也没有找伊朗麻烦的打算，甚至不得不开始和伊朗和好来防止美国的打击。那些铁了心和伊朗过不去的逊尼派酋长国们则因为和美国走得太近惹急了包括基地组织的国内激进派，陷入了国内动荡当中。这个时候如果再和反美的伊朗过不去，逊尼派酋长国们也要考虑政治影响。小布什政府冒失地替伊朗打碎了四周的高墙铁栅，伊朗在中东地区显得格格不入的做派在看起来更让人恨的小布什面前，几乎都不再算是罪过了。

意识到自己力量来源的伊朗，就此把反美当做进一步争取国际空间的最大本钱，也成为它抵挡各种近邻敌意的最大盾牌。纵观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在中东所有战略举措的背后都有伊朗追随的影子。无论伊拉克、黎巴嫩还是利比亚，美国每次出兵都会剿灭或严重削弱原有政权的权威。伊朗要做的就是一方面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尽可能延迟美国的征服时间，削弱美国的兵

锋，进而强化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则趁机在那些地区扶植或强化代理人政权，加强伊朗的政治声望，并树立了自己在伊斯兰世界唯一正面反美的形象。但是伊朗牢牢把握了一个底线，那就是伊朗绝不在任何战场和美军直接交火，伊朗不会给美国机会直接打击伊朗，在这方面双方是有默契的：伊朗知道美国也没有决心再陷入一个比伊拉克更艰难的战场。这就是今天伊朗和美国所面临的处境：他们在中东地区都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他们在战场上无数次面对，但是他们都明白双方冲突的边界在哪。

但是现在，这场棋局快走到了结局。美国和伊朗都开始面对真正的风险了。对于美国来讲，伊朗就像其大中东战略令人不愉快的副作用，只要副作用不至于影响到美国的步伐，那么美国还是希望不同时开辟两个战场。现在，随着叙利亚战局的长期化，美国真正意识到了伊朗力量越大越强，它已经能够真正捆住美国的手脚了。但是美国军人在战场上厮杀太久了，美国在伊朗还虚弱的时候没有能够推翻霍梅尼，今天为了越大越强的伊朗，美国又要付出多少士兵的生命呢？伊朗现在看起来局面不错，美国和盟友们的厌战已经大召于天下，以色列的任何举措都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同仇敌忾，盟友们对伊朗的依赖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胜利某种程度上还不能说就是百分百属于伊朗的。伊朗表现出了战乱中火中取栗的本事，却没有让人信服的消化吸收的能耐。无论伊拉克还是叙利亚、黎巴嫩，大什叶派走廊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伊朗如何让这片燃烧战火的土地重回和平繁荣？从伊朗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说，它不但未表现出征服后治理的过人本领，而且被一次次代理人战争弄得民困财穷。此外，什叶派的扩张今天之所以看起来没那么显眼，归根到底是美国人的存在太不得人心。但是，逊尼派究竟能够忍受到什么地步，现在看来逊尼诸国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沙特等国在此次叙利亚内战中的表现已经称得上和伊朗公开对垒了。

今天的伊朗需要表现一个度，它的扩张界限究竟到什么地步才能不再次成为区域内的公敌。相信如果伊朗领导层足够明智的话，他们也该明白在中东二十多年的混战中收获已经足够。伊朗要获得的是一个保证，足以让她不用把战利品吐出来的保证。是美国人的承诺吗？是俄罗斯的保证吗？已经看起来足够强大的伊朗只能相信自己。核武器，就是看起来最顺理成章的棋子了。如果核开发成功，那么伊朗就算是成功地下完这盘棋了。美国会接受吗？考验的不是美国的实力而是意志力。当棋局走到最后关头，两个曾经默契很久的敌人已经无法再次用含糊其辞来对待彼此的关系。他们都有掀翻棋盘的能力，但都有自己的明显弱点。伊朗会在和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对垒中走到哪一步，没人能现在做出定论。唯一可以承认的是，能将棋局走到这个地步，伊朗人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意志已经足够赢得世界的尊重或重视了。

【书 讯】

《学术与人生——俄罗斯民族学家访谈录》

（俄罗斯） B. A. 季什科夫 著

臧颖 译，丁宏 校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6 月出版

这本访谈录介绍了俄国著名民族学家 B. A. 季什科夫对 7 位苏联时期资深民族学家的访谈。“全书以对话的方式，通过对这 7 位著名民族学家人生之路和学术追求的客观记录，描绘了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的历史境遇”。书中收入的 9 篇附录，涉及到季什科夫教授自己对民族学、民族研究的观点，特别是他对于“俄罗斯公民民族”这一概念的观点以及对我国民族问题的评议，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